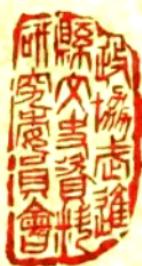


10.11

武進文史資料詳集

第四輯



# 目 录

一、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萧石光访问记（节录）	吴之光（1）
二、三河口延陵中学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梅鹤徵（7）
三、回忆解放前武进县的三次选举	孙秉澄（12）
四、武进县国民党、三青团内部斗争的片断回忆	盛景馥（17）
五、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遭遇和结局——父亲的一生	姚广圻（21）
六、吴稚晖事略	毛学勤（28）
七、杨霞峰先生传略	梅鹤徵（38）
八、刘焯生平事迹	金振之（42）
九、恽铁樵传略	毛学勤（48）
十、蒋庭曜生平事略	蒋庭铨 蒋 劬（52）
十一、吴镛	焦溪乡乡志办（59）
十二、太平天国在常武地区的军事斗争	丁中秋（63）
十三、抗战初期新安大刀会	刘光耀（86）
十四、记郑陆地区章浩明游击队	吴之光（100）
十五、武进县红十字会简史	时雨苍（105）
补 白	
民国十年沿江四乡决堤灾赈记	（11）
恽代英为妻守义	（47）
兰雪女祠	（58）
《昆陵高山志》简介	（62）
封面题字：谢稚柳	
封面设计：施育民	

# 黄埔军校第六期 女生萧石光访问记（节录）

吴之光

萧石光女士，现年八十四岁，一九二七年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毕业，曾获中校军衔。据萧石光女士介绍，她是黄埔军校女毕业生中唯一健在的人。一九三五年，她任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名噪一时，与国民党武进县教育局长孙有光、公安局长许宝光，号称“常州三光”。她的老伴张云鹤，是武进南夏墅都家桥张家村人，长期在教育界和国民党军队工作，曾任国民党宝鸡警备司令部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一九八一年病逝。一九八二年三月上旬，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笔者和另一位同志前往合肥采访。她在儿子张少鹤家中接待了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下，饱经风霜的老人，枯木逢春，恢复了生机，对共产党、对四化建设充满了信任和信心。

## 接任武进女师校长

“常州城里有个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在青果巷。当时，有初中、高师和附属实验小学，可以安排三十多个教师。所以，女师校校长是个肥缺，地方上争得很厉害。当时国民党武进县党部里有所谓党务派、非党务派。我是湖北人，虽然与武进人张云鹤结了婚，可是没有在武进干过事，和两派都没有

瓜葛。两派争夺的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请我去主持女师校。我刚好从南京文化学院毕业，还未找到工作。前任校长庄敏求先生当时正也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非党务派的教育局长钱金兆势将下台、党务派的孙有光上台之前，钱金兆上报二个名单到省教育厅，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大猷的女儿陈婉珍。当时，省教育厅厅长是周佛海，我的老上级，就批准了我。名单一公布，满城飞飞扬扬，说萧某人是周佛海的亲信，等等。说实在话，在旧社会没有靠山，就找不到饭碗。

一九三五年暑假，我去接收女师校了。地方上攻击我的人很多，叫庄敏求不要把校印交出来，斗争很激烈。连我出门不坐黄包车、不坐轿子（当时人们认为是有失体面），也在地方小报上讽刺挖苦。我的个性倔强，越是斗我，越不买帐。在我丈夫张云鹤的家乡南夏墅，有位著名的开明人士钱伯显先生，由他出面到女师校去协助接收，巧取校印。拿到了校印，我就行使职权，可以招生，可以办事了。

当时规模，初中四班、高师三班、附小等学生共一千多名。教导主任是浙江人陶宗皋，后来是庄叔迁。学生中有现在常州一中的退休教师孟舜华，和钱伯显先生的女儿尧如（即钱立华烈士）。她们都是当年我任校长时的女学生。”

## 一二·九运动在常州

“担任武进县女师校期间，值得纪念的是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这是在北平发生的青年反日爱国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号召‘武装保卫华北’，影响全国，声势浩大。

这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常州青年学生群众热烈响应‘一

二·九’运动，形成高潮。这天上午，上海复旦等大专院校学生赴京请愿，要求抗日，预定下午到达常州。常州学生闻讯，纷纷组织示威游行，集中到火车站，迎接上海学生请愿团，并准备同车前往。省常中、私常中、县女师等学校学生共有一千七百多人参加，下午四时左右，齐集火车站，等待赴京请愿。

县教育局局长孙有光非常紧张，打电话给各校校长，要求前去劝导学生回家、回校。我接到电话后，就赶往火车站。当时，私常中校长顾绍炎、省常中吴校长也到了。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天快黑了，许多学生家长怕孩子出事，也赶来劝说，也有骂的，也有动手拖的。我去动员女师校学生自治会会长盛英，要她带领同学回去，她不肯，坚持留在车站。我们几个校长，劝说不动，也只好留在火车站上，等待事态发展，怕学生出事对家长交代不了。当时学生的情绪非常激烈，爱国热忱十分动人，只要听说火车来了，学生们就会纷纷卧轨。

没有多久，省教育厅派来督学曹书田，合同武进县的行政人员，赶到火车站，是单放龙头开来的。他在站台上召集学生训话，用一张桌子一张椅子，站在上面，用话筒喊话，大意是：‘爱国抗日，人人有责。你们青年学生要求抗日是正当的，政府也是主张抗日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你们不用再去请愿了，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读书，赶快回到学校里去，回到家里去。’曹书田喊哑了喉咙，可是没有一个学生动身，不时有人说‘骗人’，‘不要上当’，也有人发出‘嘘、嘘’声。一直坚持到夜里十一点多钟。省督学在孙有光陪同下先溜走了。青年学生们看不到上海方向有火车开来，火车被阻在苏州车站了。当时天气很冷，学生们都没有吃晚饭，又饿又冷，经校长和家长们耐心劝说，才慢慢整队回去，很有秩序，互相约好次日再来。

当时，常州以东到戚墅堰，西到奔牛，铁路沿线都有学生，站着的、坐着的，爱国歌声不断，声势很大。

国民党当局为了平息学生风潮，教育局长孙有光和省督学曹书田等商量，决定通知各校停课，寄宿生停膳，动员学生回家。要求家长看住学生，不让出门。我校由训导主任戴修琨负责。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访学生家长，传达教育局通知。首先到学生自治会会长盛英家里，要她的母亲看牢，不给出门。也有些家长把孩子锁在家里，主要是走访各级级长和学生会骨干的家长，只要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学生闹不起来。这个办法，居然有效。停课几天，风潮一过，就又开学复课了。

经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抗日热情没有冷下去，转到更实际、更有效的工作上去了。特别是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后，尤为突出。一、各中等学校都实行军训。我们女师校也不例外。我去请来公安局长许宝光帮助军训，教实弹射击。请教会办的武进医院护士长教战地救护。大家在操场上挖了防空洞，还弄来几架防毒面具，教学生怎样防毒。我们还办了一个展览室，陈列救护、包扎等各种模型，校外的学生和群众团体也来参观。二、为伤兵服务。‘八·一三’抗战，伤兵运到常州，我们就组织学生为伤兵服务。学校里的几架缝纫机，专门为伤兵做衬衣，布是大成公司刘国钧先生捐献的，先后做了一千多件衬衣。还组织慰问团到伤兵医院慰问、唱歌、替伤兵洗衣、洗脚。并募捐慰问品送去。

抗日形势越来越紧张。十一月，我把两架显微镜和部分理化仪器，还有万有文库部分图书，装上小船，运到南夏墅都家桥张家村张云鹤家里，也算我的家里。是理化教师、上海人黄衡石负责运送，由张云鹤的哥哥张耀宗亲自动手砌了夹墙，保护下来。抗日胜利后，全部交给潜化中学，这件事，今天看来不

稀奇，当年看来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 回家办学

“一九四八年春天，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南夏墅老家。我们当教师出身的，怎能赋闲？还是想办教育。和一些朋友、熟人商量，决定办一所中学。经费哪里来？由张云鹤出面募捐。有些地方人士象钱伯显先生、杨灿生先生捐了地皮，作为校址。寨桥的米商俞和尚慷慨捐献校具，捐了三个教室的课桌、课凳、黑板和四只仪器柜。这种义举，使人感动。常州刘国钧先生、上海招商局张立三（武进人）先生都有些捐献。众人帮忙，在坊前复魁庵创办了潜化中学。第一学期办三个班，初一两班，初二有一班。张云鹤任校长。我任教务主任，教史地。时章生任总务主任，兼任体育、图画、音乐课，还带领学生种几亩田，补贴校用。

在武进农村办学，也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目，因为张云鹤在当地领导过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后来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当过大不小的官儿，竟敢在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地区办学，至少有‘通匪’嫌疑。因此，国民党武进县党部书记长李渺世就派党报——《武进中山日报》社社长李天行来潜化试探，说什么‘你们怎能在乡下办学。’我的学生——女师校附属实验小学毕业生羊宗达，后来经过特务训练，当了前黄区区长。潜化中学在他的境下，他也跑来‘关心’我，因为我是黄埔军校出身，又参加过复兴社，他心中有数，对我们还算客气的。

一九五一年，政府接办潜化中学，改为公立。我和张云鹤由苏南行署文教科介绍去山东教书去了。”

萧老告诉我们：“我老伴虽然去世，晚年仍很幸福。一九六

四年退休后，就和儿子张少鹤住在一起。张少鹤现在是安徽中医学院讲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媳妇是护士长。有一个孙子二个孙女，一家团聚，和睦快乐。”

萧老对家乡很有感情，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一再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回常州看看，回南夏墅看看、我们也一再表示热忱欢迎。

萧老一生，经历了第一、第二两次国共合作。现在虽然年逾八旬，仍表示愿为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作出贡献。

谨祝萧老健康长寿，称心如意。



# 三河口延陵中学 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梅 鹤 徵

一九四八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已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收复和解放了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土地，消灭了敌军大批有生力量，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我澄西地区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对敌斗争形势也迅速发展。那年八月底，我接受地下党领导王鹏同志的委托，利用老关系，进入三河口延陵中学（现改名为三河口中学）任教师，秘密搞地下革命工作。在我去延陵中学前的一个晚上，王鹏同志曾到我家。他把当前敌我双方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并把延中情况作了介绍。九月初，学校开学，我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延中只有三个初中班，教职员九人，学生一百二十多人。教师队伍中，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都有。校长邹少勤先生，是武进教育界前辈，当时是国民党县参议员。他曾是我澄西县县长俞迺章同志小学时的老师，一直有较深的关系。那时俞虽已北撤，但邹和留守在澄西地区的李顺之、汪明、陈元度、刘伯铨等同志常有联系。他弟弟幼勤也在校任教，是倾向我党的。十月中旬，澄西区地下党领导李顺之同志即派顾文卿同志（代号老四）前来，由邹少勤介绍，和我接上关系。他向我传达党的指示，宣布吸收我为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给我的任务

是以延中为基点，在进步可靠的青年教师学生中，发展地下团组织，并逐步向外扩展。我接受任务后，即着手搞这项工作。到年底，先后发展老同学陆振岳（东姚村人）、张仁迪（谈墅小学教师）、徐维镛（焦溪小学教师）以及延中学生顾荷珍、梅鹤年、吉沛云等六人为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一九四九年一月，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辽沈、淮海战役已胜利结束。但国民党政府还妄图挽救残局，总统蒋介石即宣告下野，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他们一面借和平谈判为名，企图欺骗全国人民，借以拖延我军南下时间；一面乘机在沿江地区调兵遣将，赶筑江防，妄图作垂死挣扎。澄西区地下党立即指示我们：为了适应新的革命斗争形势，配合大军渡江，地下团组织必须迅速扩展，迎头赶上。为了加强地下团的领导，地下党叫我物色一位政治上可靠而又有组织能力的同志来河口帮助我工作。我便推荐老同学高涤云。高是镇江人，是我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他过去在校，因参加学运而被校方无理开除。那时他正在无锡前洲小学任教。我将他介绍给地下党后，不久顾文卿传来已获批准的消息。恰巧国专同学陆振岳从无锡回三河口，我（感到很高兴）便先派陆到前洲和高涤云接洽。不久顾文卿即去前洲，正式发展高涤云为地下团员，并约定下学期后，高即来三河口延陵中学搞地下团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学校开学，高涤云名义上是新聘的史地教员，实际上主要是干地下“新青团”工作。当时延中团工作，即由我和顾文卿、高涤云三人负责。顾不住学校，他以半公开身分不定期来往传达地下党的指示，并经常同高涤云外出进行团的组织工作。我们当时的工作，是在坚持澄西地区地下党领导李顺之同志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

当时地下党给我们的任务是：

一、迅速扩大团的组织。我们利用一切关系在进步青年中秘密传播革命书籍，如毛主席的《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新人生观讲话》以及《蒋党真相》、《论四大家族》、《群众周刊》等书籍。这些书大部分是地下党供给的。我们收到后，书面都用牛皮纸包好，改装成教科书和医学书散发出去，向青年教师、学生等宣传革命理论和革命形势，扩大影响，启发他们觉悟。在地下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发展较快，延中从内到外，就发展到十七人，并扩展到其它地区。横山小学由徐维镛、李钧介负责；郑陆桥小学由梅汉民负责；西辋村由李伯正负责。工作扩展到常州城区，局前街小学由李中孚、汤惠芬负责，私常中（现市二中）由梅希全负责，共有三十多人。

二、开展对敌宣传。通过邹少勤先生等关系，我们买到一架短波收音机，经常在半夜秘密收听“延安电台”广播，摘录当时解放战争胜利消息和“新华社评论”等有关材料，刻板油印后，便通过多种渠道散发给国民党驻军、保安、自卫等部队及乡保长等，以动摇他们的军心，并指给他们主动自赎的机会。当时驻在河口镇文昌阁的乡自卫队长徐云生即通过关系主动找我们表示愿意立功自赎。一九四九年三月，上级党派邵乃奋同志来河口检查工作。我们即通过邹少勤先生先安排邵宿在徐云生家，后秘密转移至邹家村邹先生家。

三、动员组织青年到苏北解放区去学习。为了配合我大军渡江，上级要求我们送一批先进青年渡江北去，参加短期集训后，再随军南下工作。在四九年初，梅希全、刘达江以及私常中两位同学曾先后来延中，由我们组织他们夜半渡江，但因那时黄田港口已被敌人封锁，未获成功。

四、建立敌后交通站。为了做好迎接大军南下的准备，上

级要求我们从沿江到京沪线（现沪宁线）一带都建立联络网。其主要任务是：一是为南下大军渡江后作向导，二是为征粮支前作准备。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长江南岸密布着国民党部队，各港口要道已被封锁。三河口街上驻有国民党三十一军一四六旅四三六团第二营和地方保安队一个中队，防卫很严。我们的地下工作也更紧张，但我们依靠群众，一切工作照常顺利进行。到四月中旬大军渡江前夕，从申港起到三河口、横山桥、戚墅堰一线的交通站都已建立好。四月二十一日夜，人民解放军即大举渡江南下，次日早晨即抵三河口。我延中团员们在党的领导下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不久，坚持在澄西县领导地下斗争的张志强、王鹏、李顺之、汪明等同志都到河口，在延陵中学成立澄西县支前办事处。我新青团团员带领大批青年积极参加了宣传、保卫、通讯、征粮等工作。当时在丰北交通站工作的同志，因成绩显著受到叶飞司令员的表扬。

五月中旬，团县委即派王作启、时永地两同志前来河口办理正式入团手续，并在三河口经纶茧行楼上举行简单而庄重的入团仪式，正式宣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延陵中学支部的成立。它是我武进县解放后最早成立的一个中学团支部之一。该校第一任支部书记是梅鹤年。

我延陵中学地下团组织在当时所以能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有党的正确领导，二是依靠当时学校领导邹少勤和教师邹幼勤等以及广大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三是全体团员发扬了机智勇敢、不怕艰苦的忘我精神。同志们都能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排除艰难，敢挑重担，在紧张时刻，往往废寝忘食地工作，其中尤以顾文卿同志为突出。他考虑问题周到，行动迅速，经常为发展团组织而日夜奔波，不辞险阻和劳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可惜他不幸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

死，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本文经李顺之同志审阅)

## 民国十年沿江四乡决堤灾赈记

民国十年(1921年)，东接江阴边境，西邻丹阳的依东、依西、孝东、通江四乡东西约长三十七里，周围约二百里的江滩沙田，入夏以来阴雨连绵，致使稻苗尽淹。农历七月中旬大潮汛，接连三昼夜狂风暴雨，江潮上涨，冲破圩岸一百数十处，圩内一片汪洋，泛滥成灾。房屋没顶，家俱什物随风浪漂入大江。农民有的迁至高岸，有的攀登屋顶以免淹死，号哭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据估计灾民约十万人。决口处怒浪翻滚，声震数里。江水入堤白茫茫一片泽国，不知多少人葬身鱼腹。当时武进县商会、公益事务所联合邀集地方各公团、士绅、各业领袖、各区董会，成立“武进县沙洲灾赈事务所”，附设在城内东横街育婴堂内。公推霍倬、龚承祖为正、副主任。登报呼吁劝募灾款。八月初，派恽曜初、吴省方等下乡查明灾民户口，以救死不救贫为原则，先将过去平粜余款一千元，发放给每大口小洋四角，小口小洋二角。一面散发馒头、麻糕、面粉、炒米等食物。同时，函电上海华洋义赈会、旅外绅商。城乡全面劝募，各界踊跃输捐。八月二十七、八、九在城内第一公园小京班义演三天，号召各工厂、商号节省费用赈灾。个人捐输也不少。屠蛰盦一人即捐款五百元，戚墅堰刘少云、谢济云等一次捐赈面粉五十五包。县、省两级也拨款救灾。据灾赈事务所民国十一年九月统计，共收到捐款(包括拨款息金)七万二千六百五十五元三角七厘。当时灾区病疫甚盛，武进医院每逢一、六在小河镇送诊给药治疗灾民。

(邵仲华)

# 回忆解放前武进县的三次选举

孙秉澄

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返南京，迫于民主潮流与广大人民的呼声，不得不宣称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实行普选，还政于民。当时全国人民也曾寄以厚望，希冀在抗战胜利之后能够真正实现民主，休养生息，同心协力把受尽日帝蹂躏的祖国建设好。

## 一、县参议员的选举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武进县政府奉令筹备成立县临时参议会（临参会），作为在普选尚未实行之前的过渡性民意机构（期限六个月）。临参会议员计三十名，其中代表区域的二十一名，代表社团的九名；规定由县党部、县政府推荐六十名（区域四十二名，社会团体十八名）上报省府，由省府圈定三十名组成。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临参会会在大庙弄中山纪念堂开幕，到会会员是旭人等二十人（是旭人、谢舜臣、陈守实、庄志英、庄曾笏、徐元龙、李天行、薛迪功、赵元静、秦邦植、羊宗秀、屠公复、陈钟英、金国屏、吴季光、谈佩言、黄尚志、郭耀宗、钱伯显、赵长风），事假二人（徐文俊、张迁），病假二人（薛有本、刘国钧）。新任县长孙丹忱及各科科长列席旁听，孙有光为议长（未曾到任），是旭人为副议长。临参会议员是由县政府、县党部所推荐，他们上报的名单

既不能代表各界又未能征询各方意见，甚至连三青团都被排除在外，因此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特别是三青团，开会、请愿、发通电、贴标语，认为临参会的议员产生不民主不合法，还揭发某些参议员的投敌附逆的劣迹。因此，临参会不孚众望，虽然开了几次会议，作为不大。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县选举事务所成立。总干事邬良弼，办公地点在双桂坊县商会内，办理选民登记和审核公布“甲种公职候选人”名单。所谓“甲种公职候选人”，必须是三十五岁以上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男女公民，而所谓“县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都必须从“甲种公职候选人”中选出。

武进县参议员的名额规定，按当时武进县人口有一百零五万，可产生县参议员一百四十三名；其中区域产生一百名（一区二十名，二区十名，三区十六名，四区九名，五区十二名，六区十名，七区十一名，八区五名，九区七名），社团产生四十三名（农会十二名，工会十一名，商会八名，教育会八名，自由职业四名）。选举办法规定：每保在乙种公职候选人中选出保代表两名为选举人，每两乡选出参议员一名，各社团的参议员由成员直接选举产生。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三日开始选举。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全县各乡镇拉拢选民——保代表争选参议员，极为激烈。如三河口、新安两乡一选再选，最后在中山纪念堂由各方监督下进行，又如龙虎塘、三井乡为抢夺选票结成怨仇，最后酿成命案。而竞选结果，国民党的席位仍占绝对优势。四月二十四日，县政府公告县参议员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名册。六月二十一日，县参议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李渺世为议长，童家驹为副议长。以后几次会议在城中公园图书馆楼下举行。

一九四八年春，县政府在原阳湖县文庙（今常州市文化宫）大成殿后面（今文化宫影剧院）建造中正堂；大成殿东西两厢空屋辟为参议会办公室。从此，县参议会每次开会，即在此举行。

## 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县政府以国代、立委选举在即，拟定吴敬恒（稚晖）、马元放等七人为竞选人名单送省请核。九月十三日，县政府、县党部按照上面指示，决定以吴敬恒、李渺世、孙有光、王慕曾、薛迪功、顾峤若六人上报作为国代候选人。十一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批准吴稚晖、袁行洁（女）为国民党在武进县的国代候选人名单。十一月二十日，吴续新（女，吴稚晖的侄女）参加国代竞选，中央又核定王慕曾为国代候选人。另外，按照选举法规定，凡有五百选民联署提议的甲种公职候选人，也可参加竞选。当时三青团江苏支团监事万怀清、地方无党派人士钱叔平均以五百选民联署提议的方式参加竞选，县参议员王淑贞（女），赵元静（女）也参加竞选。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全县九十七个选举区域同时进行投票。原定二十四日开票，后因乡区票柜一时不易送县集中，乃延至二十七日起在中山纪念堂开票。由县政府、选举事务所、县党部、三青团商定开票工作人员，预定三天即可揭晓。开票两天后，因故延期，直至十二月五日再开票，当天宣告开票结束。十二月六日揭晓：吴稚晖八万五千二百九十四票，当选国大代表，第一候补王慕曾七万一千八百十九票，第二候补万怀清六万九千五百零二票，钱叔平一万二千三百三十六票；女国代竞选：袁行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七票当选女国大代表，第一候补吴续新四千八百七十一票，王淑贞一千二百八

十九票，赵元静三百七十二票。

开票两天后，为何一直延至十二月五日再开票？在县临参会席数及县参议会的竞选中，三青团与县党部就发生了很深矛盾，引起激烈斗争。国民党提名吴稚晖为国代候选人，三青团方面表示同意支持，因为吴稚晖毕竟已年逾古稀；问题的焦点是候补国代人选，县党部提出王慕曾，三青团提出万怀清；论资历他俩不相上下，论基层的选举实力，武进人对王慕曾甚为生疏，而万怀清有全县三青团作支柱。竞选期间，万怀清一直不动声色，直至投票前三天登报启事参加竞选。县政府、县党部向中央请示；国民党中央党部急电令万怀清以服从党纪为重，切勿参加竞选。万怀清表示宁可不做党员、不做团员，一定要参加竞选。三青团控制的区域选票全部投万怀清的票，有些选票根本未曾发至各乡镇，而是在西官保巷刘守仁家楼上把选票都写上万怀清的名字。而县党部所控制的选票又不得不分写吴稚晖、王慕曾的名字。因此开票第一天，万怀清、吴稚晖得票最多，第二天仍然如此，王慕曾的票数寥寥无几。事后，县长翁怪向万怀清两手作揖道歉说：“中央一再来电，如果不把吴稚晖、王慕曾选出来，唯县长与党部书记长是问，所以不得不向省选举事务所请示，领回空白选票，写好后投入票柜。事先未能奉告，苦衷难言，深表歉意，务请鉴谅。”这就是延期开票揭晓的原因。

一九四八年一月，立委选举开始，划定武进、无锡、江阴、宜兴、溧阳、金坛、丹阳七县为一个选区，由七县选出立委五人。武进县张九如（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江苏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在各报刊载启事参加竞选立委。张九如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智囊团的成员之一。武进县长翁怪是政学系的人，而三青团在南京的最大支柱就是张九如。县党部虽是国民